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历史价值及现实启示

姬书雅

(延安大学, 陕西省延安市, 716000; *通讯作者, 2431198742@qq.com)

摘要: 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 践行落实了群众路线, 发挥了重要的信息传递、群众动员和政治教育的作用, 为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基层政权提供了有效途径。文章分析了该制度的历史背景、具体举措、政策制度及其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的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对当代理论学习、新闻传播、基层治理和群众工作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延安时期; 工农通讯员; 群众路线; 新闻传播; 历史价值

引言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工农通讯员制度是党密切联系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创新。该制度通过选拔和培养基层工农群众担任通讯员, 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借鉴延安时期新闻学者陆定一的一句话来形容延安时期党报中的工农通讯员, “这种报纸, 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 而且, 更重要的(再说一遍: 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1]。”而《解放日报》副刊部编辑陈企霞, 曾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晓畅的文字写道: “一切文化都是劳动的成果, 但在旧社会剥削制度下, 劳动人民反而被摒弃在文化‘堂奥’之外提倡工农通讯写作的本质意义, 是使劳动人民夺回丧失已久的权利, 成为‘自己所创的劳动成果——文化’的主人, 唯有如此方能达成社会生活的真正的合理和普遍的幸福[2]。”

1. 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历史语境

工农通讯员制度作为延安时期新闻活动的一大特色, 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与当时特定的革命环境密不可分。这一制度, 既是中国共产党于延安时期开展新闻宣传工作的关键举措, 也是动员、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投身革命斗争, 为实现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的有效手段。

1.1. 革命斗争环境的需要

首先, 延安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 革命斗争形势复杂严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始终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封锁和限制。这种政治军事封锁使得边区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几乎被切断, 而且国民党利用其掌握的宣传工具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污名化”宣传, 散布谣言称中国共产党为“赤匪”、“土匪”、“共匪”、“强盗”等, 试图瓦解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3], 此时党真正的声音难以传播到国统区和沦陷区, 导致外界对边区的真实情况也知之甚少。

而日伪政权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的同时, 还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和新闻封锁。在沦陷区, 日伪严格管控新闻出版, 大肆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等殖民思想, 对进步报刊和抗日言论进行残酷镇压。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急需建立自己的信息传播渠道, 通过有效的新闻宣传方式来打破敌人的新闻封锁, 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准确的传达给广大工农群众, 动员他们一起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及时听到群众的声音, 了解其反馈和需求来灵活调整政策方针, 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稳固党与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

1.2. 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所处的陕甘宁边区, 地域虽广阔, 但交通十分不便利, 其广度东靠黄河, 北起长城, 西接六盘山脉, 南临泾水, 南北长约500公里, 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 20余县, 约150万人, 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4]。且当时的陕甘宁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 由于土地

革命后地主军阀对根据地实行围剿，极大地破坏当地的农业生产活动和正常的生活，所以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农业生产极度萧条的贫苦地区。

抗战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困难，绝大部分的群众每日都在温饱线上挣扎，而读书学习对于他们更是一件难以奢望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导致了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相对于其他的地方严重滞后，知识分子稀少。这些因素导致了消息出现了不及时、甚至闭塞的情况，上传下达无法即时准确的办到。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提高群众文化素质，夯实革命的群众基础，与群众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在这场意义深远的运动中，工农通讯员制度应运而生，成为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深刻揭示了新闻事业的本质和规律，为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工作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引。其核心观点强调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论断明确了工农通讯员的角色定位与工作方向。在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被要求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社会、分析问题。他们通过深入基层收集群众的生产生活故事、革命斗争事迹，将这些素材转化为新闻稿件，既反映群众诉求，又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使新闻工作成为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例如，通讯员撰写的关于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报道，不仅展现了群众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更传递了党领导下团结抗战的坚定信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工作者思想和行动的规范与引领。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在工农通讯员的工作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新闻采写环节，通讯员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获取第一手真实素材，坚决反对虚假报道和主观臆断。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使报道更具思想深度和指导意义。在新闻传播方面，工农通讯员注重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不同群众群体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新闻。如通过编写顺口溜、快板等方式宣传党的土地政策，让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关于新闻传播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要求。同时，通讯员在工作中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反思工作中的不足，改进新闻工作方法，确保新闻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指导工农通讯员的新闻实践，还对通讯员队伍建设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在人员选拔上，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标准，优先选择政治立场坚定、群众基础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定认识的工农群众加入通讯员队伍，从源头上保证了队伍的思想纯度和政治素养。在培训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核心课程，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案例分析，帮助通讯员深刻理解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人民属性以及社会责任。同时，组织通讯员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小组、主题研讨活动，鼓励他们将在新闻工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此外，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对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表现突出的通讯员进行表彰和奖励，树立学习榜样，营造良好的队伍氛围，促进工农通讯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为更好地开展新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2. 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具体举措

2.1. 不断完善制度，覆盖群众

延安时期期间，为了规范和推动工农通讯员工作，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体系。1939年，《新中华报》发布《我们对于奖励工农通讯员的决定》，明确了通讯员的任务、权利和奖励办法，为工农通讯员制度奠定了基础。1940年，《边区党委关于通讯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确规定通讯员队伍中工人、农民、士兵占比不得低于70%，优先选拔“在生产一线表现积极、能反映群众呼声”的基层劳动者。而这种选拔标准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将新闻宣传的话语权交还给工农阶级，打破了旧新闻业的精英垄断。

不仅如此，各级党报纷纷建立通讯组织，例如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各抗日根据地、工厂、学校、部队中设立通讯站，形成了遍布基层的通讯网络。同时，建立了通讯员登记制度，对通讯员的基本信息、工作情况进行记录和管理，确保通讯员队伍的有序发展。1943年，《解放日报》2月16日发表的《展开通讯员工作》一文中规定，通讯员候选人需在所在村（厂）召开群众会议，由至少5名工农群众现场陈述其“是否关心集体事务”、“能否如实反映群众意见”，形成书面评议材料纳入考核。这一举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群众路线”转化为实质的政策，既可以在选拔中保证通讯员的可靠性，还可以获取其他群众的认同感。

2.2. 积极选拔培训，培养群众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深刻指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本动力[5]。在延安时期复杂而关键的历史背景下，这一理论于工农通讯员选拔工作中得以充分且生动的实践。工农通讯员的选拔坚持以工农群众为主体，注重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优先选拔在生产劳动中表现积极、对党的政策有一定理解、热爱写作和宣传工作的工人、农民、士兵等。同时，兼顾不同行业和领域，确保通讯员队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各方面群众的意见和需求，真正赋予了工农群众新闻生产主体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的培训工作，始终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培训内容上，既包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的政策方针等理论知识，又注重采写技能、群众工作方法等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了提高通讯员的业务水平，采取了多种培训方式。一是集中培训，举办通讯员训练班，邀请报社编辑、记者等专业人员授课，讲解新闻写作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巧，介绍党的政策和当前工作重点。二是极具群众化特色的“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诸多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深入到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地区，手把手的以最直观的方式指导工农通讯员写作，将理论课堂搬到了田野乡间，搬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将“到群众中去”的理念落到实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抽象概念，而是在广阔的基层大地中得到了有效传播与蓬勃发展，为党的新闻事业、革命事业筑牢了坚实根基。

2.3. 内容基层视角化，贴近群众

马克思主义强调认识的辩证运动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而工农通讯员选拔与培训工作构建起了新闻工作者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其中稿件内容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内容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但呈现方式充满基层视角与群众话语。

一方面，经过细致选拔与培训的通讯员深入群众中，在日常生活时穿梭于田间地头、工厂作坊，与百姓促膝长谈，耐心收集基层信息，将群众的生产经验、生活诉求转化为新闻稿件，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来自群众的心声。不仅如此，工农通讯员还积极投身于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工作。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创办壁报、黑板报等文化阵地。在创作壁报、黑板报内容时，通讯员们结合时事热点、当地实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党的理念、生产技巧、生活常识等传递给群众。这些文化载体遍布根据地各个村落、工厂、机关，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延安时期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就指出：“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兵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6]。”

另一方面，通讯员又将中共中央的政策、先进思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群众，成为党和群众沟通的桥梁。延安时期通讯员长期生活在群众中，他们拥有充足的素材和灵感，摒弃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运用质朴、通俗的语言，使党报内容更加鲜活、让群众喜闻乐见。通讯员报道的内容多是广大群众所关心的抗战、合作社、农事、大生产等，颇具服务性和生活气息。通讯员非常擅长将延安的民间文化运用在新闻报道中，如《群众周报》写“妻子”的时候用“婆姨”《群众周报》有一个原则就是一般不会把中央决议的原文放在报纸上，领导的讲话原文也不会出现[7]。通讯员会仔细揣摩群众的接受能力，对党的决议和领导讲话进行适当的改编，用群众语言写群众爱看的文章。群众在阅读这些报道时，不知不觉地接受知识的熏陶，文化素养也在日积月累中得到提升。1943年边区推行“变工互助”政策时，通讯员李有源以亲身经历撰写《边区人民要变工》，用“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铁索桥，风吹雨打不晃摇”的民谣式语言，生动阐释了集体生产的优势。

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具体举措，不仅加强了党与工农群众的联系，推动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也为后来的新闻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在新时代，我们应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不断完善通讯员制度，发挥其在联系群众、宣传政策、推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3. 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历史价值

作为一种新闻业务形态，通讯员制度并非延安时期首创，中国古代报业、近代商业化报纸以及苏联党报实践中均有通讯员的身影，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后也一直注意组织通讯员[8]。不过受制于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与党组织本身的人员构成，在延安时期之前红色政权一直无法从容开展文化与新闻建设，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合法稳定的陕甘宁边区，终于获得了实施，通讯员运动也在党组织和党报的全力推动下蓬勃开展起来。

3.1. 践行落实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理念深刻揭示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延安时期，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和艰巨的建设任务，党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有效方式，深入了解群众心声，凝聚群众力量。工农通讯员制度随之发展，它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贯穿于新闻工作的全过程，践行群众路线，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做出贡献[9]。

工农通讯员们积极深入基层、扎根基层，与广大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们紧紧相连。他们穿梭于田间地头，活跃在工厂作坊，在日常的劳作与交流中，敏锐捕捉新闻素材。无论是农民对土地政策的期望，还是工人对生产条件的诉求，都被他们一一记录，真实地将群众的声音传递给党和政府，切实做到了“从群众中来”。

同时，通讯员们肩负着重要使命，将党的政策、方针进行深入解读，并以通俗易懂的方言、生动形象的故事等方式，传播给广大群众。他们通过举办小型宣讲会、在村口张贴图文并茂的宣传海报、利用农闲时间挨家挨户讲解等形式，让党的理念深入人心，动员群众积极投身革命建设，圆满完成“到群众中去”的使命。

在传统新闻传播模式下，信息往往在层层传递中出现内容偏移或时间延误。而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通讯员们如同无形的纽带，一端连着党和政府，一端系着普通群众，让新闻工作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群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新闻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它为群众路线在新闻领域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所积累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为后续党的群众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2. 意识形态建设发展

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意识形态在巩固阶级统治、凝聚社会共识层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延安时期，身处复杂艰难的革命环境，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强化思想引领、凝聚各方力量的紧迫任务，工农通讯员制度成为党开展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力军。

通讯员们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坚定指引，对革命事业抱有热忱与忠诚，深入乡村、工厂等基层一线，用心观察、记录，通过撰写鲜活生动的稿件积极宣传党的主张。他们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土地政策等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基层群众娓娓道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化作群众身边可感可知的行动指南，党的方针政策也得以在基层落地生根。

在基层的广阔天地中，通讯员们开展的新闻宣传工作如同一场及时雨，有力地抵制了封建思想残余的侵蚀。封建思想长期禁锢民众思维，诸如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封建迷信对民众认知的误导等现象屡见不鲜。通讯员们通过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逐渐唤醒民众的自我意识与反抗精神。同时，面对敌对势力的恶意造谣、虚假宣传等不良影响，通讯员凭借真实、准确的报道，澄清事实，拨乱反正，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在这一过程中，群众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与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对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不断增强。

工农通讯员制度巧妙借助新闻传播这一灵活且广泛的形式，将党的意识形态精心包装，以贴近群众生活、易于群众接受的方式广泛传播。无论是田间地头的生产动员报道，还是村庄集会中的抗战事迹讲述，都让党的意识形态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实现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大众化和生活化。这种润物无声的传播方式，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成效显著，使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民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也为推动革命事业持续向前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思想保障，为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筑牢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3.3. 新闻理论本土化探索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自从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融合，更加本土化便是一个大难题。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传统新闻理念难以契合革命形势与民众需求。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的诞生与发展，是新闻理论在中国本土化探索中的关键一环。

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紧密扎根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土壤，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要义与中国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当时，广大工农群众作为革命的坚实力量，其生产生活状况与革命进程息息相关。工农通讯员制度积极发动来自基层群众的力量，用他们熟悉的群众语言风格，以群众的视角敏锐捕捉新闻素材，进行新闻创作。他们撰写的新闻作品，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满含质朴的群众话语，生动展现了基层群众的真实生活与奋斗场景，因此更接地气、更具蓬勃生命力，也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

通过不断发展完善的举措，工农通讯员制度成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它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本土化积累了宝贵经验，从通讯员队伍建设、新闻宣传工作等多方面，为未来构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借鉴，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闻领域勇于理论创新、积极实践探索的伟大精神。

4. 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的现实启示

4.1. 坚守人民立场

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的成功，本质上是人民立场的胜利。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一制度启示我们，无论是新闻宣传工作，还是基层社会治理，都必须坚守人民立场，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发生巨大变革，我们可以借鉴工农通讯员制度中深入群众、贴近群众的理念，更好的发展当下的工作。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搭建沟通桥梁，鼓励新闻工作者、基层干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声音，解决群众难题，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数字化时代焕发新活力。

4.2. 筑牢思想阵地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力军，为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引领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的今天，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新闻工作者应学习工农通讯员深入基层宣传党的理论的做法，创新传播方式，将党的创新理论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传递给群众。可以结合当下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理论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影视剧、网络文学、动漫作品中，让其潜移默化的深入人心。同时，要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与建设，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及时澄清一些谣传错误言论，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筑牢思想防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4.3. 推动理论实践

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新闻理论本土化作出重要贡献。这一实践启示我们，在新时代新闻事业发展中，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相关院校在注重学生理论培养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如何在热点事件中分析事件，如何将理论知识与新媒体传播力相结合，以更易懂的语言向身边的人传播理论知识。此外，还应鼓励新闻工作者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进行创新发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模式，推动我国新闻事业高质量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4.4. 培育群众参与意识

工农通讯员制度通过发动群众参与新闻工作，构建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当今社会，面对突发事件应对、重大战略实施等任务，需要进一步培育群众参与意识。可以借鉴工农通讯员的选拔培养模式，挖掘和培育媒体平台上“草根宣传员”，发挥他们在群众中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激发群众们的主动性和群众们的创造性，汇聚群众智慧和力量，提升群众参与意识。

5. 结语

延安时期的工农通讯员制度，堪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新闻实践深度结合的伟大创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之下，其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愈发夺目。回溯历史，这一制度深深扎根于群众史观，它有力推动了意识形态建设，加速了新闻理论本土化进程，为革命事业筑牢了坚实舆论阵地。

立足当下现实语境，其中所蕴含的人民立场、理论与实践相融的理念，为新时代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强化意识形态引领、推动新闻事业蓬勃发展以及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借鉴。这一制度深刻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伟力，亦启示我们，唯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持续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更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的凝聚功能、群众路线的纽带作用，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 陆定一.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N]. 解放日报, 1943-09-01.
- [2] 陈企霞. “理发员”和他的工作 [N]. 解放日报, 1942-10-08.
- [3] 李国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破解污名化宣传的历史经验 [J]. 党史博览, 2021(2): 34.
- [4] 朱理峰.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J]. 经济与社会发, 2011(10): 118-120.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7] 连小童. 浅析延安时期党报通讯员制度 [J]. 青年记者, 2014.20.082.
- [8] 朱进东, 韦仕祺. 延安时期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人民指向——《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的演变脉络 [J]. 中国出版, 2019(22): 69-71.
- [9] 李海波. “细腻革命”：延安时期通讯员运动的动员技术分析 [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4): 100-105.